



——
弘扬海州优秀传统文化专辑

海州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员会

第三期

主编：胡正德 编委：徐恆渭 龚昌世 孙大伟 施 颢 庞云翹 许赞有 黄秀英 责任编辑：孙海平



封面设计：孙海平

海州文史资料
第三期

政协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员会
编 印

准印 苏连出准印
证号 (96) 第 041 号

印数：1500 册

连云港市电业印刷厂承印

(封面摄影 “秦东门” 城雕)

1996.6



海州文史资料

——弘扬海州优秀传统文化专辑

(第三期)

政协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员会 编印

一九九六年五月

序 言

政协海州区委员会主席 胡正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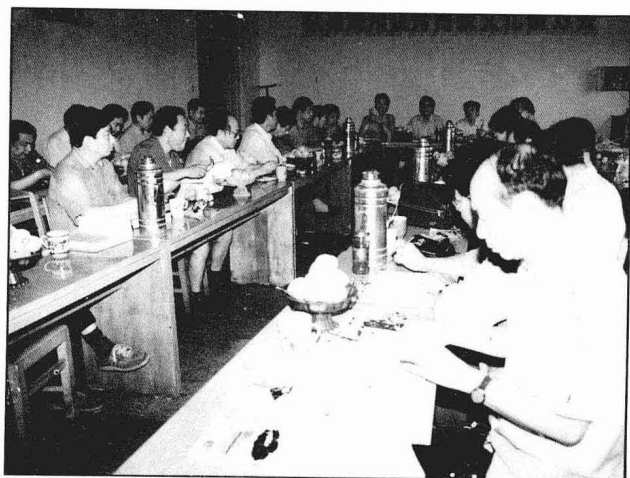
海州，为连云港市的摇篮，向以“淮口巨镇”和“东海名郡”著称。自秦置朐县以来，海州隶属多变，几经易名；沧海桑田，

几多兴衰；但这方水土上的优秀文化却世代绵延。从石器时代的遗址，先民东渡的旧迹，秦之东门的立石，海上丝绸路的门户，齐鲁分野的界碑，史前图腾的文化，无不展示着先辈们创造的文化奇葩。这个地方，人称海州人，语言叫海州话，山曰海州山，海叫海州湾。古老的文化渊源和其特殊的地域位置，形成了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的海州文化。千百年以来，这里古风蕴籍，文气沛然，孕育了众多文化名家，引来了无数骚人墨客，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海州人民，乃至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不是一般意义的要求，而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传统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纽带。”我们目前正处社会大变革时代，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如不及时挖掘、整理、研究、弘扬，现代意识将会冲刷掉历史的陈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亦将出现断层现象。

政协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员会、连云港市历史学会、连云港市古建筑园林工程公司联合举办的“弘扬海州优秀传统文化研讨会”，得到了连云港市著名学者专家的热情支持，得到了仲其臻、杨东野、李洪甫、刘凤桂等同志的真情相助。与会者怀着浓烈的桑梓之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再现了古城海州深厚的文化渊源、历史沿革和旧貌新颜；再创更加辉煌的新海州的情怀，亦贯穿于篇章之中，流动于字里行间。这次专题研讨会议在我市尚属首次，对于传承海州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海州，建设海州，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地方的文化，是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重要精神力量。谁都相信，富有创造力的海州人民，一定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把家乡建设得更富强、更繁荣、更美好！



一九九六年五月

“弘扬海州优秀传统文化研讨会”场景

目 录

序 言	胡正德
略论古海州宗教文化艺术的基本特点	杨东野(1)
从古海州志辨新浦之初四疑	韩世泳(4)
海州方志编修考略	张卫怀 曹寿田(9)
关于《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主要编纂者的刍议	许厚文(14)
浅谈《镜花缘》	吴中成(19)
海州书法史迹述略	陈凤桐 朱炳旭(24)
清代戏曲与海州	朱秋华(30)
论海州刘氏家族与崇祯皇帝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朱炳旭(34)
《东海黄公》考源	王志坚(40)
《图经本草》中的海州药物考释	吴舟(43)
海州建置区划沿革简述	孙海平(45)
秦东门寻觅	刘凤桂(48)
“胸山、胸县”初探	张义壮(52)
海州“胸”字地名何其多	陈中(54)
秦东门与徐福东渡入海处	李克文(55)
徐福楼船此际开	
——邑人吴之椿的咏徐福诗浅议	汪维懋(58)
北云台山佛教、道教的发展与建筑	张树庄(59)
中华气功文化探源	
——古海州的道教和气功	滕英(62)
海州的大慈禅寺	曹棚(66)
认识海州	张传藻(67)
孔望山和花果山	(北京)于光远(69)
试论海州“花文化”	梁乐声(71)
古海州的书院	郁正佑(73)
古海州的学宫	郁正佑(75)
海州中学建校起始考	谢长厚(77)
江北名流沈云沛	张传藻(80)
海属报界名人陈新明	张学仁(82)
充实文化内涵 完美海州古城	彭云(84)
海州的近代建筑及其价值	张祖桂(87)
仿古建筑管见	
——兼谈海州仿古建筑中的不足	骆玉宽(90)
浅谈海州胸园的美学构思	杨同本 张佑元(93)
弘扬传统文化 促进经济建设	
——关于海州传统文化转化市场经济建设的构思	刘洪石(95)
关于发展海州古城文化的构思	滕步华 仲跻敏(97)
淮海东来第一城——海州	张峦耀 魏锋之 徐腾(100)
建设古城 弘扬海州	海州区城乡建设委员会(102)

略论古海州宗教文化艺术的基本特点

杨东野

西域佛教及其文化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延至徐海,形成一种宗教派系,而与中国传统的道教共存相依,逐步地发展推广开来。在古海州,宗教文化艺术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很大影响,曾出现过灿烂多彩的景象。

一、早期性与古朴性

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封地在徐州的楚王英即“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既信道教,又做佛事。地属徐州之域的海州遂传来了佛教,开始建祭祀之寺宇。据《金石录》载:“永寿元年(公元155年)春正月,有汉东海相桓君,修饰祠宇事”;“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夏四月,东海相山阳满君,修饰祠宇事”。这可说是海州建宗教祠宇的早期之记载。在佛教传入之初即建佛塔,早于佛像之传入。海州最早建立的是“鹫峰石塔”。据《云台山志》卷二[寺观:法起寺]条中云:“[李偏德法起寺碑文]:有寺曰‘法起’,相传鹫峰石塔建自汉时……”说是汉时康居国僧人游方到宿城建立此石塔,西域僧侣曾园寂于此。

孔望山汉代摩崖造象群隼刻出现于东汉桓灵之际,早于大同云岗和洛阳龙门的北魏石窟造象,亦早于敦煌佛教艺术,乃是九州石佛摩崖第1尊。在孔望山龙洞以西茂密的丛林中有1尊硕大的圆雕石象亦是汉代的作品。从这尊石像整体雕刻技艺上看,石像的腿间、腹下、尾部均没有缕空,这在汉代石兽的雕刻中是常见的,代表了汉代立体石刻的典型风格;而阴刻线条的技艺也是汉代画像石刻的基本特点。这些都表现出海州佛教石刻的早期性。

这种早期性体现在古朴性上,以孔望山摩崖造象来看,其雕刻技法明显地与汉画像石是一致的,大体有凸面线刻、剔地浅浮雕、高浮雕、单线阴刻4种。如X68、X66和X21及其周围的人物,酷似东汉桓帝时期沂南画像石的作品,是用凸面线刻法;又如X1、X2、X82用的是剔地浅浮雕,酷似徐州茅村墓的汉画像石;再如X21涅槃、X83和X82舍身饲虎图中的虎头,都是用高浮雕的技法。以上是利用了峭壁起伏的自然形势、借突起的山石修凿而成,这些与山东安邱董家庄汉画像石墓中的雕刻颇为相似。孔望山摩崖造像上的4座小龛,是用单线阴刻,似画像石、画像砖,与山东临淄发现的东汉石刻颇为相似。这些都表现了海州雕刻技法的古朴性。

二、交融性

佛教初传中国,作为一种神仙方术,即与本土的道教相结合,形成相得益彰之势。佛教与道教互相交融、合流,是中国早期宗教造像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在古海州宗教造像艺术上是有明显表现的。孔望山摩崖造像,有18组105躯,所表现的是佛、道教与世俗的题材,是以道教为尊、佛教为主的形象,是把佛、道教交揉在一起的。在同一坡面上,佛教题材有X21涅槃像、X82、X83舍身饲虎像等;道教题材有X68、X66、X1像和2、3、4号龛内画像,都是太平道教的造像。在X68、X66和X21下方山石上所凿的园形香炉或灯碗,X66像下方刻出的莲座,在4个小龛内的阴线画像,以及衣冠服饰,都表现出佛、道交揉。

在这些摩崖造像的群体中,以西王母、老子像居中居上,显示其至尊的地位。其中X1与X66是

门亭长与弘扬佛事的施主，都居于突出位置。这些造像都侧身向着涅槃盘像，其他戴锐顶帽的俗装像几乎多朝向举右手作说法状的立佛或坐佛。立佛和坐佛都散布在涅槃盘像之上侧，作“施无畏相”，这些都表示佛临涅槃前为众弟子等说法的情景。这里有哀悼的群像围绕在涅槃盘像上下，也有跪着面朝佛像在倾听佛说法，还有执花、双手托盘盒向佛作最后的供养，这些都是围绕着“涅槃变”为主题展开的。此处镌刻佛、道交揉跃然石上。

在孔望山摩崖造像下面原有一座大庙，乃是东海庙，在山脚留下的石碣形碑座是东汉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东海庙碑》之座，正是道教见证之物。遗址X1、X68、X66等都是道教造像。汤用彤先生说过“东汉佛教是依附于道教而存在的”。东汉时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他是道、佛教并奉的，佛、道教在艺术造像上的并列与交揉是顺理成章的。花果山上三元宫也是佛、道教结合、交揉的一个典型所在。此处36座寺院群体建筑中，多数是佛教的庙宇，还有道教的寺观，如玉皇阁、吕祖庵、真武殿、老君堂等，在这些寺院中都是佛、道教偶像并塑的，足见三元宫的群体寺观是佛、道交揉的。

三、普遍性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徐海地区，佛教寺宇建筑与佛教文化艺术亦经历朝历代在古海州一带逐步传播，可以说遍及各地，具有普遍性。据记载，东汉时在宿城山中有法起寺的建筑，并有鹫峰石塔；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在中云诸曹村溪云山后建云门寺。唐朝诗人描写唐时佛寺的盛况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时期海州一带佛教寺宇遍及各地，唐开元六年在隔村隔峰建崇善寺；唐开元十一年在海州城建大云寺，时为当地最大的寺院，海州刺史李邕特撰《大云寺禅院碑》，新罗通禅师曾在此住持；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建立众香寺，后改为中兴寺，再改为龙兴寺；元和二十年在海州东北巨平山东山（即新县）建立兴国寺；在大村有心净寺；在孔望山有海龙王庙，后改为龙洞庵。宋代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在大村建海清寺并阿育王塔；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在海州治西街建大悲寺；景定元年在太伊山前建佛陀寺；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在大伊山后建古佛寺。在南云台山即花果山中有三元圣宫，初建于唐，重建于宋，敕于明。兴盛时，由36处建筑组成一个建筑群，是一群佛道教大融合的场地。明朝时对法起寺、云门寺等作了重修。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有石佛寺、安和寺、国清寺、圣福法宁寺、嘉佑院等归并于此。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在鹰游山镇建海寺；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重建殿宇廊庑，计百余间，徒众日甚。据《云台山志》卷二〔寺观〕条中所记：海州云台山区自汉至清所逢寺宇有：法起寺、云门寺、三元圣宫、石佛庵、大佛殿、观音堂、观音庵、地藏庵、华严庵、海清寺、船石庵、禅兴寺、兴国寺、安和寺、海宁寺、悟道庵、雪道庵、悟正庵、蓑衣庵、吉祥寺、崇善寺、长春庵、白云寺、大佛寺、碧泉庵、丹霞寺、镇海寺等四五十座。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自汉至清，海州包括赣榆、沭阳共有寺庙104处，并有祠宇、祭坛54处，合计有158处，真可谓庙宇遍及海州各地。

这些寺院许多是藏经、诵经、大做佛事之所在。据《云台山志》卷三〔艺文敕谕〕条文中记有明神宗所撰《颁赐藏经敕谕》，赏海宁寺经书41函并旧刻藏经637函，并嘱僧人悉心诵读、珍藏。三元宫设有藏经阁，藏经甚多。该寺盛时每日香火不断，多达20000余家，住寺僧数百人。每年正月十五前后远近数省信男虔女络绎不绝，鞭炮烟火通宵不绝。海清寺千百年来香火不断，阿育王塔内东壁上盛延德等人刻石记云：“天圣二年正月，内设供僧八百五十人；天圣三年，设供僧九百人；天圣五年，设供僧一百人；共计一千八百五十人。”明清时法起寺前后有大殿、中殿、天王殿、净土阁、弥勒殿、藏经楼、法堂、方丈、祖堂、仓库及群房200余间，盛时僧侣360多人，香火不衰，江淮来朝者络绎不绝。

从历代寺院建筑及藏经、佛事活动观之，可见古海州佛教文化之普遍性。

四、渗透性

佛教传播一般是先传佛教故事和偶像,然后才是译经活动。随着译经活动的发展,人们对佛教内容的了解不断加深,就推动着造像活动的发展。佛教造像于公元前后出现,随着便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绚烂多彩、奇异引人的佛教艺术形象。佛教由于大量运用具体形象,树立偶像进行传播而在历史上被称为“象教”。自西域传到内地以后,从汉代至明清,佛、菩萨的形象既作为被膜拜的偶像,又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而一变再变,后愈来愈变成人间的世俗形象。尽管在形象上有所变化,而题材与内容仍以小乘教为主,基本上塑造与表现的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创教的形象,多数绘制、雕塑、镌刻的是释迦牟尼及弥勒佛的说法图,属于佛教起源的本生(本缘)故事,释迦的涅槃图,以及小乘教经典所演译出来的佛教故事等,有众多的菩萨、沙陀的形象。在东汉桓帝时,大月氏人支谶、支曜等从西域前来传布佛教,也把贵霜王朝时期所创造的犍陀罗艺术带了进来,随着佛教造像之风从西域到内地逐渐趋向兴盛。佛教造像表现形式主要是石窟壁画、石窟塑像(千佛洞)、摩崖造像、木雕、石刻塑像等。东汉末时的孔望山摩崖造像的佛教题材,就是依据安世高所译《小泥洹经》(即涅槃)、支谶所译《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中所述的涅槃变、舍身饲虎的内容与形象而塑造的。造像中的 X2、X61 和 X76 佛像的手印姿态,都是把右手抬到胸前,掌心向外,左手置于胸前持一袋状物,都同东汉的译经相合。在造像上有头戴尖顶垂翅帽和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都是佛教初传来的反映。佛像全身有凹入形之身光,在《观佛三昧海经》(观像品)中有记述。佛教造像中的 X2、X21、X61、X71 和 X76 等像,有“项光”,有“肉髻”,有以手势作“印相”,有以双足交叠作“结跏趺坐”,衣服多为“通肩大衣”,这些佛教形式都是按照西域佛教经典所塑造的。

孔望山脚下之石雕大象,足踏莲花,正与叶波国太子须大努以象施人、乞行莲花上同;象旁雕出 1 人,又与故事中欢喜受象之梵志相同。此象旁之人,系《经律异相》中之梵志。这驱象者乃象奴也。这些基本上吸取了犍陀罗造像所表现的形式,结合本地传统技艺的手法而形成的。初建于唐、重建于宋、敕赐于明的三元宫中庞大的佛像、道教建筑群,所塑造的众多的佛、道教偶像,正是犍陀罗艺术的渗透与我国传统技艺交揉的产物。

西汉末年,西域僧人越流沙跋涉来到中国内地传教,开始把阿育王建塔的故事传来,康居国僧人游方到宿城建起石塔。北宋天圣元年(公元 1023 年),在大村、花果山下按照印度迦利色迦王时代所建之佛教寺塔建造的阿育王塔(亦称海清寺塔),是一座典型的宏大的佛塔。它高 40 余米,为仿阁楼式,9 级 8 面,砖石结构;2 至 9 层是平座,涩式腰檐;8 层以下,外壁内绕以走廊,塔中心砌八角形中心柱。整个建筑结构典雅、朴实,风格雄浑凝重。《海清寺塔柳峦记碣》中写道:“上观,似从天降,回彻清霄;下看,似从地涌成,宝堂连海”。塔底存放着石函、铁匣、银棺、鎏金银棺、银方匣、银金舍多件,塔内安置着“舍利”、“佛骨”、“佛牙”等,并细腻地镌刻着《涅槃变图》。这座古塔就是深受西域造塔的影响而建立的。古海州地区对佛教经典与技艺的吸取而形成自己的样式与风格,这便是渗透性。

(作者系连云港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副编审)

从古海州志辨新浦之初四疑

韩世泳

新浦——连云港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这个崛起于古海州版图上的新兴城市，历史很短，至今不足 200 年。按理说，象这样年轻的城市，历史应该是很清楚的。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它“问世”之后，特别是它的最初形成发育阶段，正遇上了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无人为其写史、修志。因此，关于新浦初期的一些基本情况，无论是报刊文章，还是民间传说，都是各有一说，给人们带来了一些疑题。近几年，我在参与编修新浦区志过程中，为了搞清这些问题，查阅了一些资料，从几部古海州志，特别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发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下面我把从古海州志中所受到的启示和由此形成的几点粗浅看法，归纳为四个方面，就教于各位专家。

一、“新浦”原意辨

如今“新浦”是地名，已毫无异议。一提新浦，大家就知道是指连云港市的中心市区。但是，对“新浦”一词的原意是什么，解释并不一致：一说是“新的水滨”；一说是一条小河；一说是“河流入海口”；一说是地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解释呢？我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对古海州地区所谓“浦”的特定含义的理解问题。因此，要弄清“新浦”一词原意，必须先搞清古海属地区“浦”的原意。

从各种辞书上看，“浦”字除作姓氏用之外，还有“濒也”、“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方”、“水源枝注江海边曰浦”、“大水有小口别通曰浦”等几种解释。古海属地区之“浦”指的是哪一种？对照一下古海州几部志书关于“浦”的载述，我认为，古海属地区的“浦”，就是指那些把“大水”引向“小口”而“别通”的小水渠。

《辞海》说，所谓“大水”是指“平原出水，言水不入土，而出于地，非涌泉出也。”在平原上“非涌泉出”“出于地而又不入土”的水，就是天上降下的雨水所形成的遍地流淌的洪水。“浦”不就是指那些将洪水汇集起来，通过一些“小口”通入大江、大海的一条条小河道嘛！这是从字义上理解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古海州志中记述的“东海诸浦”的特征，问题就更清楚了。

第一，《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都把“浦”列于山川卷“海州诸水”中加以载述。特别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把大村温水河也放在“浦”一起记述，并在“温水河”条下特意加上“此河为小水，故次于东海诸浦之间”的按语。

第二，从古海州志对“东海诸浦”的注释看，古海州地区的所谓“浦”有四个特征：一是“上无源头”。二是“下通海潮”。三是“便渔舟盐舶”。四是相当一部分经过了人工疏浚加工。如嘉庆海州志载：“社林浦，长十五里，阔三丈，深五尺”；“栖云浦，长五里，阔三丈，深七尺”；“台浦，长五里，阔三丈。岸有石墩如台”等。

从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古海州之“浦”，实际上就是指沿海滩地上那些无正式源泉的、季节性向海里排泄洪水的各自独立的小水系。而后经盐工、渔民加工，成了运盐河道和渔船停泊避风之处。

古海州沿海滩地上为什么会有这些独立的小水系呢？这是海州海岸不断变迁的结果。据海州志记载，古代海州城离海边很近。可到了“明万历六年(1578年)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这277年间，由于黄河全部走苏北入海，泥沙骤增”(《连云港志》，使苏北海岸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泥沙的淤垫，使海岸迅速向海州古城东北方向迁徙。原来在大海中的云台山，在这期间逐渐离海归陆。在其周边现出了大片大片的海滩。夏秋大雨季节，洪水漫流，顺势汇集由低洼地带入海。久而久之，这些汇集洪水入海的低洼地带，由于不断受洪水的洗刷和海潮冲淘，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自然形成了一条条“上无源头”、“下通海潮”的小水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滩变成了新盐滩，成了人们晒盐、捕鱼的场所，这一条条小水系又得到了疏浚加工。便成了具有上述明显特征的“东海诸浦”。

海岸的不断迁徙，使这些通称“浦”的小水系的下游不断延伸，使其保持“下通海潮”的功能。“新浦”就是在这种过程中产生的。古城海州东南方的海岸，原在现板浦以南。由于大海北徙，出现了“板浦”。后经修浚使板浦河和运盐河正式沟通成为“场河”，至“板浦口”(即现板浦镇一带)入海。后“板浦口”以下淤塞为海滩，出现了“卞家浦”，经人工挑疏，运盐河又经板浦、卞家浦从卞河口入海。当卞河口以北又淤成滩地时，从卞河口至孔望山东北处的大海边，又形成了一条小水系，因出现于板浦、卞家浦之后，时人称之为“新浦”(因此河流经朐山脚下，当地人又叫朐山河)。“新浦口”为其入海口。经盐商捐资疏浚，新浦河又成了整个运盐河下游的新河段。“新浦口”理所当然地成了运盐河的入海口。这就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所载海州“甲子河记”所说的“中河……北汇板浦为场河，又自板浦历卞家浦，过孔望山，出州北为新浦，皆漕运所经”的“新浦”。由此可见，“新浦”与东海诸浦一样，原是在古海州海岸变迁过程中形成的“上无源头，下通海潮，便渔舟盐舶”的小河流的名称。其入海口——“新浦口”才是当初的地点名称。现在新浦这个地名，应是由“新浦口”简化而来的，而不是“新浦”河名的沿用。

二、新浦初位辨

新浦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开始就在现在新浦市区这一带？还是在什么别的地方？在一些材料中，说法也不一。有的说，当初“新浦”在“卞家浦北，州城以东的地方”；有的说，在“现在东海富安至大浦闸一段河口。”哪种说法确切呢？我认为，前种说法比较确切。可以更具体地说，作为地方名称的“新浦口”，起初就在孔望山东北部，现玉带河与西盐河交汇处的工农桥和玉带河闸附近。因为《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收录的海州甲子河记，为我们提供了具体依据：

第一，“甲子河记”说“新浦口”是新浦河的入海口，也是甲子河与运盐河(现西盐河)的接头处。这和玉带河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玉带河借用了甲子河下游河道。按古州志记载，海州玉带河原在海州城内“自城东马家汪至西水关。”后州牧孙明忠曾改蔷薇河为玉带河。现在的玉带河是近代开挖的，分东西两段。我们这里所说的是1956年重新开挖的从新海电厂附近至西盐河的西玉带河，它是沟通蔷薇河和运盐河的重要河道。它的走向是从新海电厂北向东，经海州城东北角的城河口、网疃庄、小赵庄至孔望山西麓折向北，在孔望山东北处与西盐河接通，交接处建有工农桥。而在这段河道中，从海州东门外的小赵庄东北，至与西盐河交汇处这一段，正是借用了原海州甲子河的一段河道。甲子河是出城东门，沿护城河向北，在城河口附近折向东，经后网疃庄、小赵庄一带到“新浦口”。现在海州东门外城河口向东的后网疃、小赵庄一带，仍可见当年甲子河遗迹。因此，现孔望山东北处玉带河和西盐河交汇口一带，应是当年“新浦口”的所在地。

第二，“甲子河记”说，“孔望山至州城七八里，崖岸犖确，舟楫不通”。又说，新开挖的甲子河“东自新浦口，西达城东门，……计长一千一丈六尺有奇”，约合3.3公里。这和玉带河闸至海州东门的距离基本相当。

第三,《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在记述海州甲子河时写道,“嘉庆九年五月,阖州士民率钱开渠,自东门而北,径城河而东,至孔望山东,接胸山河,达于板浦”。甲子河开挖年代,正是知州唐仲冕主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之时。“甲子河记”是唐知州利用在率众开挖甲子河过程中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亲自撰写、当即入志的。资料是真实可靠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浦一地最初的位置应是在现孔望山东北处的玉带河闸一带,而不是在其它地方。

当然,从“新浦”这个小河名称,是当时人和一些形成较早的“老”浦相比而称呼的这一点看,别的地方也可能有叫“新浦”的小河流,甚至其入海口也叫“新浦口”。水利专家武同举所著的《江苏水利全书》中就说“(海州)城之西北也有新浦,亦有运盐河。”(《江苏水利全书》(二)卷二十三)。但这里所说的“新浦”和我们现在的新浦应该说是两码事。

三、新浦年龄辨

新浦这个地方的历史究竟有多长?这是对新浦初期基本情况认识不够一致的第三个问题。多数同志认为新浦的历史很短,至今不足200年。可有些同志持不同意见,却说连云港市海、古、神、幽,闻名遐迩,“与新浦相距不远的海州、花果山阿育王塔、赣榆徐福村、历史相当悠久。新浦年龄从何算起?值得研究。”这实际上也是涉及到当初“新浦口”一带是如何形成的问题。

研究任何一个地方的历史,都离不开对其周围环境变化的分析。新浦的出现、兴起与古海州海岸变化密切相关。在这个方面古海州志书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根据古海州志记载,早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的夏商时代,海州就属徐州。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里就设置了胸县。因“胸山压海口”,州城临大海,至东魏武定七年(549年)改为海州。

海州得名于海,海州变化也在于海。刘洪石、张传藻两位同志10多年前曾写过一篇题为《从出土文物探讨连云港附近距今2500—6000年间海岸位置兼论明、清以来云台山成陆原因》的论文,指出古海州一带曾几经沧桑。在“五六千年以前锦屏山和大村的先民们是来往相通的。从锦屏山到中云台、南云台,并没有海洋的阻隔。”而后,由于宇宙变化多种因素,古海州一带海平面迅速上升。“到秦汉时代整个云台山完全被海水包围”,“锦屏山的前沿也受到上涨中的海水威胁。”“直至清初海州城东仍为海浸,云台山孤立海中。”后来因为黄河决口夺淮从苏北入海,引起了海州海岸的快速变化,以至又出现了清康熙四五十年间(1701—1711年),云台山和海州之间逐渐淤积成陆的现象。古海州志书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也很多。如乾隆三十七年的《云台山志》说:“康熙十六年,漕运总督帅颜保奏仍复云台山为内地时,山在海中,……康熙四十年后海涨淤积,渡口渐塞,至五十年忽成陆地,直抵山下”;道光十六年谢元淮总修、许乔林纂辑的《云台新志》说,云台山“自古在大海中,康熙庚寅(即康熙四十九年)辛卯(康熙五十年)间海涨淤积,始通陆地”。再如1923年吴铁秋所著《苍梧片影》也说,“康熙四十年辛巳以后,可望不可及的神山,一旦成为平地。”

但所有这些都只是说,自清康熙四五十年间,云台山和海州海岸之间,开始有陆地相连,并没有说明先从哪一段连起,连接有多大片场。而事实上,现今新浦这一带,其时不但没有“一旦成为平地”,而且到距今200多年前,仍是古海州的近海区。《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收录的康熙四十九年淮安知府姚陶写的《云台山记》就可证明。记曰,“庚寅夏,余以赈饥至海州,念海屿民困尤甚,携帑金自海州恬风渡海,甫登舟,暴风作,舟人不敢渡。余曰:‘饥民枵腹待赈,奈何不行?’遂扬帆。至中流,风益甚,蓬索尽断,大桅忽折,声震若雷,一舟皆惊,无复人色。山下观者飞舟来救。余笑曰:‘刺史固无恙也’。易小舟,到山下,入凤凰城,即南城也。”“恬风度”旧名黑风口。广二十里”(《江南通志》)。黑风口,也就是现在海州区锦屏镇范庄村的黑风口。据此记,我们可以看出,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海州东门外的黑风口,到南云台山西南角的南城之间,依然是惊涛骇浪的险恶海面。渡口又明明竖有“舟中人众休争渡,海上风高且暂停”的警示牌,而姚知府还冒险从此渡登凤凰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海州东北部与凤凰山之间,尚无旱路可走。

另外,从古海州内河变化情况来看,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因板浦口以下淤塞,海潮不通,向北新开了卞家浦。到了“嘉庆三年(1798年)淮北盐商卞家浦海岸淤垫,捐挑戽河”(《江苏水利全书》)。盐商捐资清淤疏浚的河道就是“新浦”。至此,新浦及其入海处——新浦口,方才“问世”。这说明,直到嘉庆初,黑风口至孔望山东北一带,才逐渐脱离大海。而嘉庆九年唐仲冕在《甲子河记》中说,“此州十年来,潮渐北徙。故恬风渡最险恶,已成平陆,胸山以东,郁州以西,得沙田数千顷。”则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从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到1804年(嘉庆九年)期间,古恬风渡及其附近大片大片海域,才真正成为陆地。现在我们生活的新浦这一带,也才随之成为陆地。

新浦这一带,为什么到这时候才海退成陆呢?我们看一看新浦周边的地势就一目了然了。

东南部的灌云:地面标高,西部为3—3.5米,局部条岭地为5—20米;东部为2—2.5米,局部2米以下。

西部的东海:西部是丘陵地带,标高为30—100米;中部为平原坡地,标高为5—7米;东部一般为2—5米。

西北部的赣榆:其北部、西部地势高亢,标高为150—250米;东部、南部地势低洼,标高为10—3米之间。

东北部的云台区:和新浦接壤的云台山西侧,为河网密布的冲积平原标高为2—3米。

海州和新浦之间的地势,总的趋势是,海州高、新浦低。海州城内一般标高为5—6米,城内东南角最高,在20米上下。海州城向北、向东逐渐低洼,到现在幸福路大转盘、临洪滩一带标高为3.5米左右。过了西盐河,即现在新浦市区,更是越向东南越低洼。唯王巷一带较高,标高在3.5米左右。而现在的新浦东小区、南小区、新浦农场,直到海州的黑风口一带,标高只有2.5—3米左右。1970年新浦地区发洪水,到处一片汪洋,火车站向东都已划了船,而王巷附近却没有上水,原因也就在这里。

从以上可以看出,新浦地势最低洼。因此,在整个古海州海岸变迁过程中,新浦地区比周边地区“出世”都迟得多,直到“恬风古渡白沙平”,才随之沧海桑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所以,要计算当今新浦的年龄,最多是从开挖新浦河,有了“新浦口”的嘉庆三年(1798年)算起,至今也不足200年。至于以后随着海岸变迁,新浦口逐渐移位到今天新浦民主路、前后河一带,那历久就更短了。因此,新浦这个地方,与早在梁天监十一年(512年)就建城的海州,与地处赣榆北部高地的徐福村,以及与建于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的花果山阿育王塔都无法相比。

四、新浦与独树浦辨

新浦与独树浦,是不是一回事,这是又一个需要辨别的问题。

“新浦”原叫“独树浦”的说法直到目前,在人们中仍然很有影响。说实在的,以前我也相信此说。1985年当时新海区和青海省哇玉香卡农场,在新浦盐河桥头合资兴建一座综合性商贸大楼时(即现在海云大厦),我就曾建议这座建筑叫“独树浦大厦”。

长期以来,人们为什么把新浦说成是独树浦呢?从一些传说和有关材料看,依据就是,新浦原是盐碱滩地,什么树也不长,唯独西跳头有一株百年老榆树。

其实,这是一种偶然的误会,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古海州志的有关记载,就可明了新浦和独树浦完全不是一回事。

首先,从形成的时间上看:

明代《隆庆海州志》有这样一些记载:“蔷薇河……东流至洪门坝及独树浦下海”;“独树浦桥……永乐五年建。”永乐五年,即公元1407年。可见桥下之“浦”形成更早。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在记载“洪门堰坝”时写道:“元季王信攻张士诚,围海州,决此堰,移盐仓于独树浦,坝遂废。”据《明史》记载,张士诚是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重新自立为“吴王”,其兵力“北逾徐州”,屯兵于海州沭阳一带的元将王信,攻打张士诚部应是在这期间。

按此记载,独树浦至少在630多年前就已出现了,比我们现在的新浦市区要早400多年。

其次,从地理位置来看,新浦与独树浦也相距甚远。

《隆庆海州志》说:“独树浦桥在州北八里。《隆庆海州志》“海州总图”中,在城池北标有“渎树浦墩”(《释名》注:“渎,独也。”)根据这些记载,以及海州蔷薇河变迁走势等情况分析,当初的“独树浦”可能就在现在海州火车站北的范庄一带。很明显这和位于海州城东北的“新浦”及其孔望山东北处的入海口——新浦口,不是一个地方。

再次,从各自所属的水系看,“独树浦”是海州西部蔷薇河的下游,早在元代即为蔷薇河的入海通道;而“新浦”则是海州东南运盐河的下游,在清嘉庆初年为盐河的出海通道,直到后来随着大海迁徙,盐河和蔷薇河同时顺势延伸,“新浦口”移位到如今新浦市区这里时,新浦这个地方才形成这种既“为运河尾间”,又“据蔷薇河下游南岸”的特殊地理位置。

至于“独树浦”名称来源,是否因当初只有一棵树而得名,无从考证。而现在新浦西跳头确有一棵近百年的老榆树。在原先只长盐蒿、白花草,直到50年代初海潮还直达后河底的情况下,西跳头能孤伶伶地活下这么一棵榆树,实为一大奇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新浦”原叫独树浦。

由于个人水平所限,对新浦初期的一些看法,肯定会有很多不妥之处,甚至造成新的误解,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求我们对新浦初期历史,能有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共识。

(作者系政协新浦区委员会副主席)



海州方志编修考略

张卫怀 曹寿田

海州地区虽偏处海隅,但修志传统悠久。从《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二、《大明一统志》卷十三等典籍所引《州旧记》、《旧图经》、《海州图志》的资料看,古海州在唐代时就已开始编修志书。¹

由于时代久远,兵灾相加,诸多旧志今已见不到完整的版本。目前所知,从明嘉靖元年至清嘉庆十年的284年间,仅《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3部完整的方志传世。

一、隆庆海州志

该志于明嘉靖元年(1522年)由知州廖世昭和张瀛之子备倭守御东西二海指挥张柱倡修。²

廖世昭,福建怀安县人。由进士嘉靖元年(1522年)知海州,蔚有文名,纂修郡志,海山胜概皆有石刻。反改国子监博士。³此外,廖世昭还注重地方教育,申行社学,创建书院。社学“在城内四隅各二,城外、东海各乡四,西海各都及坊十四,共计社学二十六所、书院四、附郭二所。……本州旧无书院,嘉靖二年(1523年)知州廖世昭申行,提督学校萧御史鸣凤改观音院为崇正、长安寺为明道,以业童生课诵,委学官考学业。郭外曰石棚,在石棚山坡;曰伊芦,在伊芦山麓。”⁴

张柱乃瀛之子。张瀛,“字文渊,寿州人。袭祖鉴职为守御海州副千户,以胆略闻,盐盗屏息。……贼徒畏惧,称曰‘海张’。”后“升淮安卫指挥僉事,世袭。”⁵与知州廖世昭关系甚密,嘉靖二年四月,张瀛在石棚山“创泉石开草堂”,“筑石棚书院”,廖世昭为之立匾为纪。⁶张柱与廖世昭的关系亦当密切,“正德十六年,备倭东西二海指挥僉事张柱申请,宁巡按改私创以为公署,……国子博士、闽中廖世昭为记”;“嘉靖元年,备倭指挥张柱建立(守备公署)于州之乾隅,……知州廖世昭有记”。⁷

廖世昭升迁后,修志未果。40年后,海州同知张峰始继其业,编定8卷。张峰,“福建惠安县人。由庚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历任四川按察司僉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谪海州同知。署州事多方爱民,加意造士。后升绍兴府通判。”⁸“纂修州志,精严有法,时称史笔”⁹张峰编修了8卷海州志,主体工程应已告竣,因有政绩,升任绍兴通判,“张左官于海,书甫成以迁去。”¹⁰

淮安府知府陈文烛“守淮期月,欲修郡志,檄二州九邑各采其事,始知其无志。”¹¹海州知州郑复亨“谋诸进士张公,因得前二守惠安张公所辑公志存稿凡三帙。括輿图,统政教,式田赋,述徭役,藏经制,总挈条分,精详宏邃,且困事著论,扬榷古今。¹²于是得以仰希专刻之请,退而与州学博易君仕、沈君廷臣,县学博于君榘,暨州之博士弟子员十人,迹张公所辑之旧,益肆讨论,稍加增饰,爰请正于乡先达、光禄裴公为之讎其讹,厘其舛,几阅再月而集成,哀为十卷,乃授梓焉。”¹³明隆庆六年(壬申年,公元1572年)志书刻成后,陈文烛为之作序于“秋日”,¹⁴郑复亨作跋于“孟冬之吉”。¹⁵

陈文烛,隆庆四年(1572年)任淮安知府,六年海州志付印,为明万历元年(1573年)编纂20卷的《淮安府志》¹⁶提供了海州地区翔实的资料。

郑复亨，“浙江仁和县人，由举人隆庆五年任海州”知州，17在海州期间，他“爱民训士，修城池，兴学，增辑张峰《州志》而梓行之。”¹⁸实际是郑复亨从张朝瑞处得到张峰所辑前8卷初稿，经修饰加工，另增后2卷，并经裴天的校正，而终成10卷之制，10万余言。刊刻版本每版7竖行，每行宋体18字。

《隆庆海州志》的主修是知州郑复亨，主要编纂人为海州训导易仕、沈廷臣，赣榆县教谕于渠，州学生员张焕、孙瓌等共13人。¹⁹

裴天祐“字顺之，赣榆人。……令建安，食御如寒士，为政务宽厚。巡按山东……晋大理……擢光禄，……既归，杜门谢客。著有《拙逸亭稿》，校张峰《海州志》。”²⁰

从廖世昭、张柱倡修，到郑复亨修成付梓，正好经历了半个世纪。

该志前有序，后有跋，设《海州总图》、《州治图》、《城隍庙图》、《文庙图》、《山川图》、《社稷图》共6幅，按照卷目体，分舆图、山川、户赋、治典、教典、名宦、人物、杂志、恩典、词翰凡10卷，除第10卷没分目外，前9卷共分79目，其内容记述范围，基本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朱棣“诏纂天下郡县志书”时所颁降的《纂修志书凡例》²¹所规定的一致。

因该志体例上“因事著论，切中要害，……颇具史裁。”²²在内容上“于风俗之间大书特书，而其所论述，皆生齿息耗、吏治淑慝，与夫幽贞之士、孤嫠之懿，篇翰之垂沉于山谷间巷者，一一可见，且贍而不秽，质而不俚”，²³成为“一方之宝鉴，而百代之信史”。由此，“探疲敝之原以还民衽席之上”，“一披览之暇而万姓疲敝之由得有所考而周知”，²⁴成为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珍藏的1000多种明代方志之一。1962年，上海古籍书店择优影印了107种明代方志，该志被列其中。1992年，由张卫怀、汤兆成利用业余时间试作标点，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市委副书记龚来宝为之作序。

二、康熙海州志

明代后期，战事频仍，社会动荡，或许州官无意修志，至少没见到有关记载。

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刘梦松任海州知州，天启四年（1624年）自觉“其钱谷转输幸得无罪，至人文风景稍稍可观，是当详其记载，以志不忘。”因几十年没有续修州志，所以“山川之所葱郁，文物之所浚发，沧桑之所更变，咸缺而弗载，”“乃集学博倪君效先，荐绅杜君一洵、赵君跃龙，庠友卞生有第、张生四可、苗生正春共聚奎楼，取前哲同知张公峰之所纂修，乡先达裴公天祐、张公朝瑞之所订正者，刻意校讎，痛加补缉。”志成后，刘梦松本人“于政事暇，复旁搜博访，删繁补缺，”使志书“华不蔓，简不陋，核不俚，废兴损益、美刺劝惩少寓旌别。”天启四年孟冬朔旦，刘梦松作《续修海州志序》。²⁵海州儒学署学正事、宿州人倪效先的《后跋》评该志“直欲表忠孝以励人心，敦简朴以还古道。浮名夙绩，置弗录也；实德潜修，幽必阐也，衮钺片言，彰瘝百世于都哉，一州明鉴，千年信史矣。”

²⁶

刘梦松，“字寿江，山西沁州人。由举人历知海州。……时邹、滕莲妖倡变，震于其邻。梦松筑城增埤，固安人心，抢攘之余，辄事编纂，有儒吏风。”²⁷

该志刘序倪跋，皆作于天启甲子，是年倪效先始任海州儒学学正，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认为重修于天启三年，实为不妥。

该志似应付梓印行，可惜不仅今已无法看到其原貌，而且在唐仲冕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时可能已不传世，因唐志所引，未及该志。

该志修成整 20 年后,明亡。

顺治十三年,庞宗圣知海州。十五年(1658年),因在祁县任知县时修过《祁县志》,遂欲续修州志,似未实施。庞宗圣,“字永华,山西闻水人。贡生。自祁县迁知海州,请免旧逋,招垦新田,续修州志未成,以赋额不足被议去官。”²⁸当时州志“版已毁之兵燹中”,仅郡学博赵无弦存二三策。

顺治十六年,刘兆龙知海州。刘兆龙,“字六御,江西安福人。曾祖佃官湖广布政使,入湘乡籍。由贡生任广西知县,迁知海州。……顺治庚子(顺治十七年,1660年),与学博及诸生……重修州志。”³⁰刘兆龙重修时,“版籍已灰兵炬,……唯郡人学博赵君一琴仅存四卷、五卷,载历朝之来守兹土者。……惜乎散而不全,……乃谋诸司铎葵庵萧君、子韦金君,乡绅昌赵君、嗣良陈君、遇春苗君,共为因故葺新而缀续之。”该志“凡夫山川形胜、疆域规制、户口盈缩、赋役登耗,以及科名之振振,忠节之表表,哲人之芳踪,仙佛之幻迹,靡不犁然悉备。由是文献足征,典型具在。”不数月志成。

31

为续修州志,赵一琴在秋七月十三日布告《海州修志广征文献启》,“伏乞域中贤士,境内名公,或得之邨架郇厨,参以古籍,或宣之锦心绣口,锡以佳篇,收诸翡翠之床,浣以蔷薇之露。”从毕秀刊刻的《康熙海州志》中可见,当时应搜求到了《隆庆海州志》的版本。所以,根据“因故葺新而缀续之”的原则,制定了两条“凡例”:一是“存旧籍”,“其所论说纪序仍存”;二是“定新书”,“刘公兆龙至,竭力设法,以助梨枣,纂修之功,述倍于作,其中不无笔削,即标其名曰六御刘氏。”

该志“凡十卷,总目因郑复亨之旧,而赋役子目删盐课,人物子目删外传,其疏略多类此。然自天启以来,数十年之文献藉以不湮,其功亦未可泯也。”³²

顺治十七年志成,刘兆龙“捐俸付梓”并于“长至日为之序。”³³

顺治十八年海州裁海后,海州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地再续修过州志。

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年)四月,山东新城人毕秀来任知州,庚戌(1670年)秋曾作一《海州志序》,序中未及修志内容,而志文中已有其姓名、碑文,或许因刘志之旧而稍增益之。但目前所见,定非毕秀作序的《海州志》之原版,今见首都图书馆(原京师图书馆)藏本的《山川》中记“锦屏山”说:“旧名胸山,……明知州翁公讳选改名青龙山,……今州守孙公讳明忠因改为锦屏山”。³⁴孙明忠康熙十三年(1674年)任海州知州,在官7年,康熙十九年(1680年)迁嘉兴府同知。³⁵可以推断,北京馆藏本刊刻时间应在康熙十三年至十九年间,也有可能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编修《大清一统志》时所上报的刻本。

该志体例上仍因州旧志,对《隆庆海州志》的内容有所删简,续述了隆庆六年(1572年)以后百余年间的有关地方史料。

该志由张卫怀等3人标点,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94年6月出版发行。

此后,陈宣续修至康熙三十五年。陈宣,“海州人,岁贡生,有文行。康熙癸亥(1683年)修《一统志》,各直省分修通志,征求山泽耆彦,宣与赵善理应聘往。书成乃归,后病瘖,杜门著书。念州志自顺治庚子(1660年)至康熙丙子(1696年)几四十年,搜集补缀,勒成一书。自言举三十七年沿革之大略,与夫忠孝节义,得于所见、所闻、所传。闻之最真者不敢略,亦不敢妄增;不敢隐,亦不敢溢美。今观其书,视他本较善。”³⁶唐仲冕《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引其志最多,但在卷三十二《叙述录》的《旧志》之中没有载述,恐因非官修方志,不便印行,故今不见其版本。故唐仲冕《自序》中仅提及“康熙中,州人陈宣续志稿”。